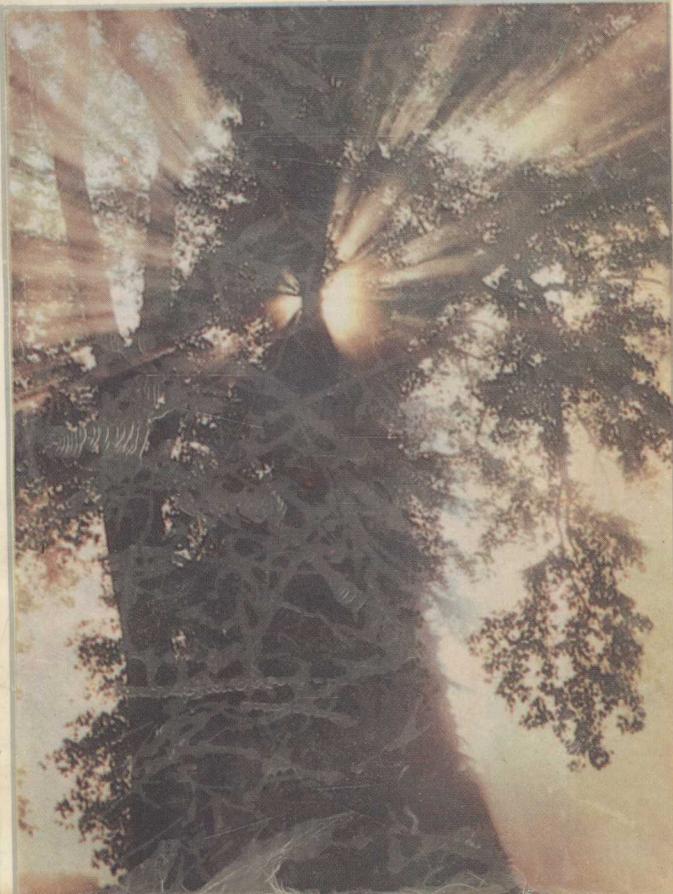


星明 编选

贾平凹
谜中谜



贾平凹
谜中谜

星 明 编选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 新登字017号

贾平凹 遗中 遗

星明 编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 (西安北大街131号)

书店经销 陕教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2插页 152千字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605-093-0/I·54

定 价：5.80元

目 录

初为他人做嫁衣	(1)
古砚微凹聚墨多	(12)
早春紫阳勿相识	(16)
如今寒梅更傲霜	(20)
阳春三月走白浪	(24)
追踪《野山》主人公	(30)
初秋镇安去采风	(45)
三赴野山得“虎子”	(64)
《浮躁》问世之始末	(77)
当代奇才贾平凹	(91)
逍遥古城会老外	(98)
平凹现象热与冷	(114)
说不尽的贾平凹	(118)
絮语平凹觅心迹	(126)
遥望平凹更逼真	(136)
商州人谈贾平凹	(140)
话说平凹回商州	(142)
良师益友数平凹	(145)
商州讲学育学子	(148)
一封通信见真情	(154)
秋游韩城朝龙门	(160)

飞往香港展风采	(165)
为谢大媒说平凹	(176)
告别烟酒艰辛多	(179)
语言艺术的魔力	(182)
数一数二是书画	(187)
一幅题联联想多	(190)
临时刻章应急用	(193)
夜与平凹话书刊	(195)
贾平凹的读书法	(198)
废寝痴读平凹书	(201)
收藏平凹有神缘	(204)

初为他人做嫁衣

邢良俊

他是贫土上长出的一棵奇树。

贫不是经济生活的穷困潦倒。

土不是他古老的家乡商州。

贫土是那片长期由极左思潮摧残的文化园地。河流早已干涸，香花被当作毒草除尽，只剩下荒寂的沙砾和锁住饥渴心灵的愁雾悲云。

他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出现在省城西安。若干年后，工农兵学员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受到歧视时，他却正以锐不可挡之势在中国文坛上崭露头角。因此，谁又敢说工农兵学员就是等外品呢？他为那个群体争了口气。

当然，这是后话了。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时，他是个不被人注意的丑小鸭。

他天性善良、诚实，甚至懦弱。在斗争、批判、口诛笔伐为时尚的年代里，他注定地成不了角色。他不好斗。不斗别人，不斗自己，只能在一场接一场花样翻新的政治运动中作个旁观者。恰好这时他患了一场不重不轻的肝炎，理所当然被隔离在一间偏僻的宿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索性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人是个需要实现的动物，不管你的同类推崇你还是鄙视你，

你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他选择的最佳表现方式就是写作。

在四堵久已未被粉刷的灰壁间，他读完了尽力搜寻来的几本有限的文学书籍，便开始了一个大作家最初的笔耕。于是，便有了一篇又一篇写在粗糙纸张上的小诗、故事、散文。于是，便有了一册装订整齐的儿童文学稿本。

稿本落在我的办公桌上。那时，我刚刚进入编辑岗位。像咀嚼了许多白蜡而后突然尝到一枚鲜果，略带稚气却又闪烁着灼灼才气的文章吸引了我。虽然写的是群顽皮村童的故事。

翻过来看署名，贾平凹。一个陌生又古怪的名字。使人联想到对立统一、阴阳两极、矛盾和谐之类。后来才知道，“凹”不读“拗”，而读“洼”，他原名“平娃”。

至今还不能解释，为什么我没按照惯例把稿本回归书架，却摆在了桌子的右上角。我一向爱整洁，书桌上从不乱摆东西。

我背对门坐着，一个带浓重方言的苍老声音响起：“老师，这是文艺编辑室吗？”

我回过头去，却看到一个低矮、瘦小、黧黑面孔的青年。说他青年都有些勉强，他简直还是个孩子。

他说他是西北大学学生，来查个稿子，他的名子，贾平凹。

我好奇地打量着他，顺手从桌角拿过稿本，请他坐下。我说，稿子读过了，很有灵气，尤其语言，流畅，娓娓动听。

他有些局促，局促中透出兴奋和激动。

我说我正在编“百花丛刊”，准备收一辑儿童文学，已从中选定两篇，《荷花塘》，《小电工》。我又说你还可选几篇投给其他报刊，他问，选哪几篇好呢？我说，《南瓜的故事》就不错。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上海某家刊物上。

出版社领导决定调一些有基础的业余作者来社改稿，当时叫做办学习班。因为伟大领袖教导我们，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各类学习班就办起来了。贾平凹的稿子本来没什么可改，我还是推荐他参加了学习班。一来请他帮我加工一些比较麻烦的稿子，二来可以使他享受到每天几毛的伙食补贴。这第二条今天听来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却确实这样想的，只不过从未向他本人提起。

他工作很投入。有位业余作者写了篇儿童文学，其中插叙一段神话传说显得突兀生硬，贾平凹加上了“据我爷爷的爷爷说……”一段过渡性文字，使文章自然轻松起来。原作者高兴又叹服。

不到一个月的学习班，贾平凹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在扩大编辑队伍时，我向上级建议，点名要贾平凹。当然，这之前我已征得他本人的同意。

1975年，贾平凹大学毕业，来到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工作。同坐一间办公室，使我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到他在文学事业上的奋斗、拼搏，在人生道路上的寻觅、追求，在不完全被人理解的环境里顽强的超越。超越他人，超越自己，最终踏上光明的坦途。

那时出版大院里还没有八层新大楼，就是灰色的旧楼也只有三层。全省就一家出版社，与出版管理局挤在一起蛮紧凑。我们文艺室几位年轻编辑被填塞在二楼朝北一间狭长的小办公室里。窗棂是花格式的，繁琐而遮光，窗外一棵高大梧桐，每片阔叶都仿佛一只小窗帘，室内终年暗森森的。然而，年轻人的笑声是明亮的。刚刚聚在一起工作，没有“文革”中的恩怨纠

葛，没有利害是非，人事关系简洁而清楚，虽说还处在运动后期，大家却也无话不谈。

贾平凹显得沉默寡言。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沉思，或画符似的用谁也认不出的竖排小字在纸上打草稿。

一次，我托他给人捎一本孙犁的《白洋淀纪事》。他截读了这本书，然后惊喜地对我说，想不到世上竟有这样美的文字。他得知此书是从社资料室借的，便问我还能借到什么好书，我将所知的乔治·桑的《安吉堡磨工》、司汤达的《红与黑》、泰戈尔的《沉船》等一一推荐给他。几年间，他读透了那间资料室，如饥似渴，如醉如痴。有次他偶然说起寒冬深夜拥被读《聊斋》，读着读着，总觉得墙角里将走出位绝色女鬼，说得大家毛骨悚然。

同事们发现他很幽默，渐渐地，便又知道他装了一肚子乡野故事，常有人央他讲给大家听，他就不好意思地一笑说：“讲讲也末（没）啥，就是宣（酸）得很。然后不紧不慢讲起来，挺长挺曲折，虽说也难免夹带些肉麻情节，但因讲得隐晦巧妙，并无甚么难以入耳的。倒是那维妙维肖的刻划，活灵活现的模仿，逗得大家前仰后合，眼泪都笑出来了。每当此时，他便抿着嘴唇，等旁人笑够了，再追补几个出人意料的情节，引来更大一场笑。

编辑部来稿堆积如山，有些稿子退过了，没几天又出现在办公桌上，于是便有了油印退稿签的发明。上边填抬头，中间填稿名，下边加盖盖章，像速食面一样方便。平凹很看不惯，便说：人家辛辛苦苦，写了稿子，鼓足勇气投到出版社，一张油印笺就打发回去，太叫人寒心了。哪怕写上两句话，也是一个安慰。又有一次，他说退稿信上宜用“来稿接读”的提法，一

个“接”字，又实在，又平等，让人感到许多温暖。

没人理会他的唠叨，退稿笺照用不误，马马虎虎办事的情况时有发生。后来我才知道，平凹此时正经受着大量稿件被退回来的苦恼。他宿舍里有只白木箱，里边装着大半箱从全国各地退回来的稿，其中不少就使用了油印退稿笺。他将心比心，产生出许多同情。当然，在无数攀登文学高峰的同路人中，他是少数成功者之一。

大凡文学、艺术、体育等门类，坐在金字塔顶尖的佼佼者，一是靠了缘分，二是靠了勤奋。

平凹与文学的缘分世人皆知。他那与生俱来的对事物的敏感触角，他那奇谲丰富的想像力，他那灵动鲜活的气韵，尤其是他那绝妙的语言驾驭能力。这一切，并不需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找。

但要把如此这般蕴蓄在天份中的核能量释放出来，准确地击中读者的心，却还要下一番大苦。路总要一步步走，格子总要一行行爬。

他没日没夜地写。

我常要提防他的突然袭击。

也许在办公室正聊天，也许在食堂吃着饭，甚至在出差同乘的拥挤的长途汽车上，他都会变戏法似的摸出一篇小说稿，让我提提意见。然后眼睛盯着地，听我说东道西一通。他诚心诚意，虚怀若谷，我却能辨别出他的各种反映。同意时便对——对——，不能苟同则沉默，大相径庭时嘿嘿地笑。想与他辩论两句，总煽动不起来，让人趣味索然。

不善交际，面皮特软，在生人面前羞怯，第一次面对摄像

机镜头时猴一样抓耳挠腮，使人联想到俄罗斯那位天才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孤僻。其实，内功实力雄厚的真人，外表的矜持总掩盖着内心强烈的自信。

某个早晨，他一走进办公室就神秘地说，咱肯定是个大福大贵之人。他说，早起洗脸，脸上有根须须咋也擦不掉，用力一扯，痛得不行，拿镜子来照，我的爷！原来是根温（那么）长的眉毛，把人吓得……

除去写作，就练字作画。爱在一个白纸小本上画钢笔速写，印象最深的是一丛挤得紧紧的树，旁边批道：天空那么大，为什么要挤来挤去。标题是“群木”。后来，他发起一个文学社，社名就叫“群木”，西安的文学青年均以能加入这个社为荣。不知后来怎么散了。贾平凹生就一个独行者，缺乏组织才能，人们在这一方面不应苛求于他。

在一起闲谈，不经意的几句话就能引发他创作的灵感。我偶然说起大学里一对青年男女的事。某女生有几位追求者，均不中意，她心中爱的恰是那位帮助处理几位追求者之间矛盾的男同学。几经曲折，那憨子才知道自己早已被彩球击中。这件趣事被他融进短篇小说《竹子与含羞草》中。同样一个素材，并不是人人都能如他那样善于发掘，精于描摹。

他渐渐被社会认可，被读者拥戴了。贾平凹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各个报刊上，短篇小说《满月儿》获全国大奖，是他从成熟走向全盛的里程碑。后来，那大半箱遭冷落的稿子，一篇篇被成群结队前来组稿的编辑们请走，绝大部分得见天日了。

成功给他带来荣誉，带来喜悦，也带来麻烦。那年月，社会上还未形成追星族，但崇拜者却尾巴一样紧跟他身后。熟悉的、不熟悉的，高尚的、卑琐的，真诚切磋的、别有他图的。他

赔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思路常被五花八门的干扰困惑。某熟人（也许是乡党）居然毫无愧色地让他替自己的儿子写几篇文章发表出去，以便为儿子的升学求职铺平道路。平凹忿忿然。我很少见他忿忿然过，就说不理他就是了，何必生气。他说，文学成了什么了，太让人难以忍受。

文学是他心中的圣洁殿堂，不允许丝毫亵渎和玷污。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的大潮将文化推向市场，贾平凹所有著作都十分畅销，创造了纯文学作品巨数发行的奇迹，从而给出版社带来惊人的经济效益，也相应地给作家带来较丰厚的物质收获，但这对平凹来说，不过是副效应而已。他的笔锋不断向生活的深层，向历史文化的深层进掘。许多年后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几位文学友人聚在一起神聊，此时平凹已是国际文化名人了。我忽然想起刚学来的一种算命游戏，就现蒸现卖起来。在这之前，我们也喜欢各种预测把戏，算命是假，借机会要贫嘴互相取笑是真。我取出几张纸，每纸分6格，每格画一几何图形，让在坐各位填数。平凹在填上2格时，拼不出任何图形，只写了5个字：不知为何物。当我指出这一格的内涵是“事业”时，他默然了。一位大作家居然不知自己的事业为何物？当然不能如此简单化地阐释。我想，也许是上苍在提醒他，不要忽略自己是“此山中”人吧。

封闭的社会环境，造成了男女社交的蕃篱，陈腐观念加极左思潮，更形成了无形的巨大压力。似乎青年男女交往的结局必须是结婚；若同时或前后与不止一位异性交友，便被视为不检点。但人生旅途，相逢偶然，又有几人能不加选择鉴别便能碰上合心的终生伴侣呢？

平凹十七、八岁，还不懂得爱情为何物时，曾经邂逅一位女性。她也许是父母的好女儿，单位的好职工，街坊的好邻居；但她注定不可能成为他的好妻子。平凹意识到这一点时，顶住舆论的压力，经历了一次蜕壳般的挣扎，将自己解脱出来。此后，他以才子特有的对美的多情与敏感，注意过几位女子，也有几位眼力不凡的女子，识才、爱才，着意垂青过他。百人百姓，有挚诚倾心却恨相见晚者，有热情似火却稚气十足者，也有逢场作戏自后反目者。平凹在爱情的十字路口徘徊良久，直到一颗明亮耀眼的星突然闪现，令他头晕目眩，难以自拔。他第一次体会到丘比特箭的不可抗拒的威力。

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人，正埋头专心读杂志。一个悦耳的女音打破了宁静。“贾平凹在哪里？我要找贾平凹。”我抬眼见一位个头高高的姑娘站在门口。白净脸盘，眼睛大而有神，鼻梁很直，嘴巴小巧，一张标准美人脸。浓密的黑发分成两把，扎成短辫垂在肩头。身材匀称，衣着朴素，落落大方中透着果断。

事后问起，平凹红着脸，说这是他村里人，名叫韩俊芳，是县剧团的演员，现在音乐学院培训。后边就说到了众所周知的“巴士奇遇”。

平凹常常追忆少年俊芳的印象。她是他同学的妹妹，虽住一村，却从未说过话。但他记得她穿着膝盖上打补丁的布裤，坐在地上和女孩子比赛抓子儿。还记得她背着自留地里生产的一点粮豆之类到两县交界处的市场上出售。平凹说这种交界线上的市场是仅存的自由贸易点，他自己也去卖过东西，为的是换回一点油盐钱。在大批“三自一包”的年月，贸易被视作非法。有一次平凹回商州，可能想到我的孩子很小，西安供应紧张，自作主张带了一篮鸡蛋给我，半路上被“割资本主义尾巴

巴”小分队作长途贩运没收了。平凹提起这些小分队就切齿。但忆起农贸市场上的俊芳却那样愉快。早已忘却的记忆突然鲜活生动起来，这难道不是一个信号吗？我断定平凹陷入热恋，默祝有情人终成眷属。

此后不久，平凹沮丧地说，他和俊芳的事遇到了大麻烦，他的父亲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原因是俊芳家“成分太高”，而平凹父亲在政治运动中已受冲击，若两家联姻，在村上必成为显眼的目标，雪上加霜，肯定会影响平凹的前途。

“四人帮”虽已粉碎，老知识分子却心有余悸。我建议平凹慢慢给老人做工作。

谁知矛盾迅速恶化。一天，平凹神情紧张地说，“贾政”亲自跑来了，指名要见我和社里几位老同志。平凹父名贾彦春，是位受尊敬的中学语文教师，平凹自幼接受中华文化精粹的熏陶，无疑大多来自这位乡儒。因他固执而专制地干预儿子的婚姻，我们戏称他为“贾政”。

平凹央我在老父面前替俊芳多多美言，促使老人转变态度。他说他未来的生活中不能没有俊芳。她是土生土长的商州姑娘，又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女性，他是他心目中美的化身，启发着他的创作灵感。我被平凹打动了，一口应承下来，自认很有点侠肝义胆。

谁知一见到威严的贾先生，听了他充满爱子之心的述说，我的舌头打不过弯来，准备好的一篇慷慨陈词不知都溜到哪儿去了，反倒忆起一个鲜明的场景。这是贾平凹在一次出差的路上很动情地讲给我的。他父亲在政治运动中被剥夺了工作权力，回到家乡。兄弟都小，家中突然断了经济来源，平凹只得辍学，每日与弟弟上山打柴。黄昏时，小山一样的柴捆压在瘦弱的脊背

上，又尖又硬的柴枝刺伤了手脸，崎岖的山路总也走不到头。转过最后一个弯，总能看到母亲焦急地站在小路当中，猛烈的山风扬起她满头乱发，像灰色的火焰。她三步并作两步奔来，卸下小兄弟背上的柴，母子三人哭作一团……

极左路线殃及多少家庭，伤害多少心灵，是贾先生头脑里封建观念在作怪吗？也许有，但更多的是痛苦的经历对他心理的扭曲，难道我们自己未被扭曲过吗？我只能匆匆说几句一般性劝慰的话，诸如父母的苦心都是为了孩子啦，但孩子的事情还得他自己作主啦等等，便逃也似的告辞了。对我的言而无信，平凹十分恼火。这件事我至今仍觉内疚。幸亏当时有刘善继、陈策贤等几位老同志以平辈的身份与贾先生谈心，多方开导他，才使父子矛盾有了转机。后来，又几经周折，平凹终于吃上了韩家的荷包鸡蛋（陕西民俗，新女婿初次上门，丈母娘要用荷包蛋招待，以示承认）。平凹说，那碗荷包蛋真甜真香。

若是贾老先生能预见日后中国社会发生的迅猛变化，他未必会兴师动众，反对这门亲事。据我所知，俊芳对公婆十分孝敬，对丈夫孩子非常尽心。她是一位贤妻良母，也是一位性情刚烈的女子。作为名人之妻，她生活得十分不易。她不甘心依附成绩卓著的丈夫，尽己所能地创造自己的独立形象，是值得赞赏的。

凭心而论，作为一名文学编辑，贾平凹的成绩不够突出，但这不能完全归咎于他旺盛的创作冲动。在编辑室里，他年龄最小，又是男同志，经常被支来支去出杂差。支援三夏，人防工程，唐山大地震时的救灾活动等等，五年编辑生涯倒有近一半时间驻外勤。从一定意义上说，参加这些工作对他开阔眼界，丰

富生活大有裨益。尽管如此，他还是参与了“秦岭文学丛书”的策划，《烽火春秋》的编撰修定等大量工作，还处理了数不清的来稿来信。

贾平凹在创作上的勤奋和突出成绩，得到了出版社有关领导同志的支持，尽可能地为他创造写作条件，在全社只有一座住宅楼的情况下，在多数同志还住号称“贫民窟”的泥墙席顶的破平房时，分给他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在二楼阳面，带一个小小阳台，虽说小得可怜，但总算是一个属于私人的空间，供他驰骋笔墨，激扬文字。

1979年底，平凹对我说，刚成立的西安市文联准备调他去工作，许诺为他解决妻子韩俊芳的调动问题。我不加思索便说，你应当去。一来俊芳的工作调动可尽快解决，二来到文联工作对今后的文学活动大有好处。我深知，要静下心来写大作品，他必须离开出版社这门诊部般的地方。

1980年，贾平凹离开他工作五个年头的陕西人民出版社，到西安市文联去了。临走时，他不无留恋，同志们也依依惜别。我想，对于贾平凹来说，出版社这段酸甜苦辣的日子，一如他“遥远的青坪湾”，很可能咀嚼出一点韵味吧。

古砚微凹聚墨多

杨玉坤

1976年7月28日夜3点42分，突然蓝光闪耀，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里氏七点八级地震，一座有百年历史和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顷刻间被夷为平地，二十四万人在蓝光中丧生。唐山大地震一时波及到周围各个省市。西安到处是地震棚，人心慌慌，一日三惊。有一次，有人喊了声：“地震”，周围顿时哗然。有人吓得竟从楼窗跳了下来，有的摔折了腿，有的摔坏了腰。就在这时，省上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指挥部下设宣传机构，宣传机构办了个抗震救灾小报，地点就设在友谊路第一招待所。我被临时抽到抗震报工作。

我到了抗震报，见到了许多临时抽调来的人，有部队的宣传干事，有新闻、出版单位的编辑记者。其中有个小个儿，他的名子叫贾平娃（就记得当时是“平娃”，不是“平凹”），是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社还来了一位细苗苗的漂亮的姑娘，长辫子。他俩一高一矮，行动在一起，很有意思。那姑娘能言利嘴，是个活跃人物，很快大家熟悉了；那低个儿话语短缺，但有时冒出来一句、半句，很幽默、风趣。“平娃”，显然是爹娘给起的名子，以后怎么不改成“官名”呢？带“娃”的名子在陕西极多。我的小名叫“懒娃”。小时候，总嫌名子难听，什么好的名子不叫，偏叫这个。后来才知是父母有意起的。我的哥